

## 为何从艺为谁歌？“文镜”柳青启人思

人物传记故事片《柳青》导演笔谈

裴亚莉

2021年5月21日，人物传记故事片《柳青》在全国上映。尽管曾经拍摄过多部获得过重要奖项的纪录片，但导演田波和制片人王苗霞，在多数观众那里，还是两个“新鲜”的名字。田波、王苗霞，他们到底是一对什么样的艺术家？在成为成熟的电影创作者的道路上，他们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生故事？他们有什么样的从艺心得？文艺到底如何为人生服务？文艺到底如何为人生、为人民服务？这都是我们想要深入了解的问题。

在观看了田波、王苗霞创作的多部纪录片、故事片之后，笔者梳理了一些问题，并收到了田波的答复。

问：你在纪录片创作之初，就回到了故乡。面对故乡的农民，如何处理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农民”和自己熟悉的生活中的农民？在农民身上，热情、勤劳、忍耐和偏狭共存，在表现过程中，如何立意，如何取舍？艺术家应高于自己的对象？还是让对象以自己的方式获得银幕上的独立性？

答：我在西安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学了手艺，开了眼。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故乡，还手握摄像机，带着两位青年回来，所看到的一切，都和曾经发誓要离开这里时完全不一样。如何拍摄这片土地上的人，如何认知他们，如何从苦涩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故事，这些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难题。

拍《佛陀塔》的时间是2006年，是我们第一次拍长篇纪录电影。那时候我就给自己立了四不原则：不猎奇、不拔高、不贬低、不造假。真实客观去记录，心到、脚到、镜头到位。其实，无论多么客观，最终呈现到银幕上的每一个画面，都是刮骨疗伤般艰难的抉择。一些镜头，我开始还津津乐道，后期却无情拿掉，这是在剪辑台上最痛苦的事，也应了那句真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一个提炼的过程。

至于我们记录的到底是不是那片土地上的真实？其实，我要说的是，那是我内心世界彼时彼刻的一种真实，是我一种审美。这一种真实，未必是别人所认为的真实，因为我看到的，别人未必能看到，而别人看不到的，我能看到。我相信，我镜头里的他们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佛陀塔》之后，我们又拍了《走马水》。

无论是《佛陀塔》还是《走马水》里的农民，他们就是那片土地上最大公约数的真实。无论是心理结构还是生活状态，我记录的是传统农民正遇到百年不遇的大变革时，生活和思想的



柳青在工作中。

电影《柳青》导演田波(左二)在开机仪式上介绍影片主创。新华社资料片

蜕变，以及他们在这个变革中的痛楚和兴奋。在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向城市寻找新生活，乡村好像被商业社会抛弃，社会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矛盾重重，也在变成一个商业社会。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农民这个阶层何去何从？不得而知。

我希望我的镜头是温暖的，没那么冰冷。在我的镜头里，他们的存在，是一种乡音。他们在故事里，好像就是聊着自己家的事，一点就明了。我更多扮演的是一个观察者。

问：从《佛陀塔》和《走马水》看来，陕北的民间文化气氛浓厚，源远流长，在新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尤其是在新的传播媒介和价值流变中，可否评价或者展望一下陕北民间文化的未来命运？

答：陕北这片土地自然环境恶劣，是一个自古战争频发的地方，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多民族交融的地方。道教和佛教比较兴盛，村村有庙宇，村村有庙会。一年四季中，除了过年这个大节，他们最关心的节日就是各种神灵的节日，非常红火热闹。大庙会人山人海，人神共舞，不可思议。这是一种最原始也最朴素的信仰，烧香拜神不是为了成为神，而是向各种神灵祷告，保佑他们四季平安、五谷丰登、人口兴旺、身体健康。这种民间信仰不是严肃意义上的宗

教信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中最原始的那种信仰。我认为这种民间信仰一旦脱离土地，脱离乡村就会消亡，乡村文化繁荣，农耕生产兴盛，传统的民间文化也就会长久不衰。

问：如何理解当初拍摄电视纪录片《路遥》和此次拍摄电影《柳青》拍摄之间的关系？

答：路遥这位人民作家毫无疑问将是不朽的。无论他本人，还是他那部用生命铸造的史诗巨著《平凡的世界》。我非常崇敬他，也受他作品的影响，导致我大学时期就开始关注现实，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在我27岁的时候，我们创作了八集《路遥》纪录片，这对我的从影历程而言，意义深远。在我艺术观尚未完全形成之时，能够有机缘全身心走进这位作家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历程，就如同缺钙的儿童及时补充钙片，让我的骨骼更加硬朗，精神更加饱满，不至于昏昏沉沉，迷茫无助。这部作品确认了我为谁而创作，为什么要当导演的信念。

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创作电视纪录片《路遥》，让我深刻认识到，艺术的使命就是揭示事物的真相，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创作者不能欺骗观众，也不能欺骗自己。我们的劳动是启发、引领大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探索生活里快乐的元素，探索寻找美的能力，沟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过去和现在的因果关

系。如果能够启发民众，那么创作者的心就会升腾起一种价值感，觉得艺术创作虽然艰辛，但很值得。路遥有句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只有这样的情感投入，才有可能成就一种事业。

我时刻警告自己，必须追问自己认识的是不是事情的本质？我看到的是真相吗？我是否带着傲慢和偏见选择了某种东西？必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最终采用的技术和艺术手段都是为这个最本质的东西服务，要不断追问自己。

没有十多年前的《路遥》创作，就不会有今天的电影《柳青》。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仿佛当初拍摄《路遥》就是为了十多年后拍《柳青》做的准备。在路遥的文学生涯中，柳青深刻地影响了他，用路遥的话说：“柳青是我的文学教父，人生导师。”路遥用他短暂的一生虔诚地继承和发扬柳青的文学精神，并且取得很高的文学成就。这种文学精神的传承造就了“文学陕军”的崛起。我也是潜移默化受到这种精神的洗礼，专门到柳青的墓地祭拜了先生。我记得曾在墓地发了一个愿望：“我必须在四十岁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把您的故事搬上大银幕。”这么做的理由很平常，就是想借柳青的生命历程和人格魅力来弘扬生而为人的良知，表达我对艺术、对历史、对共和国创业史的一种思考。在我看来，柳青就是

一面当代文坛的镜子，他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为谁而歌、为谁而活、为何从艺。

问：经过多次修改，《柳青》越来越显示出一种近乎“完美”的气质。但是比起之前纪录片的拍摄，影片的开放性难以阻挡地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创作者，你们的真实体验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满足感和不满足感的矛盾交织？

答：电影《柳青》是一部非常难拍摄的电影，这种困难超乎常人的想象，尤其是作家人物传记类的电影在国内本来就很罕见，而柳青这个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又非常复杂。在以往的电影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对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呈现，所以表达的尺度就很难把握，好像是在无人区的冒险探索。影片历经九次大改，现在看来近乎“完美”，作为编导的我，无法用言语表达那种复杂的心情。因为柳青精神，这部作品从孕育的时候就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问：“用严肃的思考和青春的热忱激活生活和历史”，对于“受苦人”的种种深情，是我对两位创作特质的整体感受，这种创作特质使得两位从纪录片到故事片的创作，都有着一种当代艺术家少有的豪迈和深沉。《走马水》中，支书出门工作、办事，妻子为他擦亮的摩托车卷起尘土，行驶在广袤的原野上；村主任和妻子收黄豆，在山坡上艰难而有经验地背起沉重的一捆豆子并放置到驴车上，无处不在的这些场面无不令人深深感动。除了情感、技术和艺术手段对于这些贴切的表达，有没有促进？

答：无数的艺术手法都是为内容和思想服务的。我们采用的表现手法是否适用于想要表达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创作者平时多研究、多思考，不能光搞形式，沉醉于形式美。我浅显的认知是，技术和艺术手段要在创作实践中锻炼，在心里不断演练各种可能，要画出来，甚至要在电脑前模拟演练，还要看大师们是如何表现的。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更能体现作者的水平，因为机会只有一次，现场瞬间万变，你把握不好就丧失了机会。不像电影，现场可以反复拍摄，纪录片几乎没这种可能。

问：在两位未来的创作规划中，想要攀登的，会是什么样的“新高峰”？想要突破的，会是什么“旧现状”？

答：无论是作家还是导演，题材的选择最能体现出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我的选择不仅是为了取悦时尚，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历时六年，电影《柳青》终于和全国的观众见面了，好不好还需要观众的检验，时间的检验。在未来的创作规划中，我们会更深入地扎根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上，寻找下一个故事。

吴健翎

## 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我想做的就是消除偏见

本报记者李晓玲

在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频繁的时代，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片土地上，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日本导演竹内亮推出的生活类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以下简称《我住》）以让中国人了解外国、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为主题，寻找住在中国各地的外国人和住在日本的中国人的故事。

竹内亮是一位居住在南京的日本人。去年疫情期间，他制作的《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武汉》与《后疫情时代》等一系列与中国疫情相关的纪录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让不少受众了解了中国抗疫的真实情况，并被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点赞”：“我们对竹内亮导演真实记录了中国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对竹内亮导演不带偏见地、真实地记录中国走过的这段非凡历程表示赞赏。这个世界太需要有人像竹内亮导演这样去传递真实的情况和真实的情感。”

近日，竹内亮纪录片同名图书《我住在这里的N个理由》，在位于深圳的全国新书首发中心首发。草地周刊就此专访了竹内亮导演。

## 消除偏见与误解

因纪录片《我住》，移居南京8年、一头卷发、能讲一口流利普通话的竹内亮成了中国“网红”。用“知乎”网友的话来评价，“这个节目接地气，很真实，有种Vlog的感觉”，深受年轻网友的喜爱。

新书《我住在这里的N个理由》脱胎于纪录片《我住》，收录了纪录片中常居在中国的20位日本主人公的故事。他们有的是漫画家、摇滚鼓手、足球教练、舞台灯光师，有的是农业专家、导演、生态学教授、陶艺大师、演员、拉面店老板。他们或因喜欢中国，或因追逐梦想，或因家人与事业而选择留在中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身边的中国人，同时也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真挚、热情和包容。

“也许因为我是外国人，我是日本人，我最

反感偏见，只要感觉是有偏见的事情，我就想亲自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想记录一下真实的情况。”

谈到拍摄这部纪录片的起因，直率的竹内亮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心。“外国人对中国（或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的信息了解不多，我想做的就是呈现普通个体的生活细节，跟踪记录拥有不同职业和背景的普通人每一天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理解不同国家和城市的风俗文化。”

最近半年来，竹内亮和他的团队每个月都会来深圳，他正在拍摄纪录片《华为的100张面孔》。“为什么拍华为？是我自己想拍的，因为华为去年被美国‘欺负’了，我就想去了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想去看一看真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竹内亮试图通过拍摄100位华为员工，全面还原华为公司的真实面貌。他透露说目前已经采访拍摄了30人，“我想拍的第100个人是任正非，希望他能够接受。”

## 纪录片的本质就是真实

竹内亮和太太赵萍及家人居住在南京。去年国内疫情好转后，竹内亮来到此前封城76天的武汉拍摄。2020年6月26日，《好久不见，武汉》上线，不到24小时，播放量就突破2500万。上线10天，话题阅读量破亿，微博热榜最高排名第一。他还制作了《南京抗疫现场》《后疫情时代》等关于中国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等情况的纪录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让不少受众了解了中国抗疫的真实情况。

竹内亮镜头中的武汉没有偏见和猎奇，有的是对普通人的注视、关怀与尊重。这部纪录片不仅澄清了关于武汉的种种谣言，也能传递给同样经历过疫情或者仍在疫情中的观众一份积极乐观的力量。

竹内亮的纪录片一向都因“真实”“客观”而受到盛赞。但竹内亮本人，却对“真实”一词有着不一样的理解。“每个人看到的真实都是不一样的，我只是展示了我所看到的真实，应该是‘主观的真实’吧，尽量保持客

观、不撒谎。”

为什么拍武汉呢？“因为疫情对中国有误解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我想把真实的中国传递给大家，我想看看真实的武汉到底什么样，就决定亲自去拍给大家看。越是有误解的东西，我越要去求证。我不喜欢‘偏见’这个词，对日本的偏见我不喜欢，对中国的偏见我也不喜欢。”

竹内亮称自己的纪录片是“三无产品”：无台本、无套路、无赞助。按他的说法，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必须是一个会“拼命努力”的人。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但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勇于追寻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纪录片的创作中，竹内亮也经常天马行空。每场拍摄都在主人公的家中或工作场所进行，拜访前，主持人只会被告知主人公所在的地点，随之而来的是第一次完全没有台本、力求真实的随机跟拍。因为节目全靠临场发挥，拍摄中也曾出现过很多突发状况，镜头也常常虚焦，但却因此给节目带来了真实感和趣味性，充分展示出每个主人公真实、平凡而又独特的的一面。

也有人质疑竹内亮的作品太过于“正面”。他坦诚地接受了这样的批评：“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所以我拍出来的中国肯定是正面的。我不希望外界误解中国，这是我拍片子的最大动力。”他说，自己坚持的原则是绝不撒谎，也不去故意引导观众，而是把判断交给观众。“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让大家能够真正了解中国和日本。”

## 多元文化的“冲突”与和谐

2010年，为拍摄《长江 天地大纪行》节目，竹内亮被NHK电视台派至中国。在为期一年的纪录片拍摄过程中，他走访了青海、四川、云南等许多地方。

“那个时候，普通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仍然只是知道高仓健、山口百惠，我特别惊讶。”中日两国的这种信息脱节，让竹内亮萌发了要向中国人介绍现代日本的想法。而与中国各地居民的密切接触，也加深了竹

内亮迁居中国的念头。两年后，在得到太太赵萍的同意后，他决定移居中国。2013年8月，竹内亮一家搬至南京定居。

“日本社会相对稳固了，变化很小。但中国却非常有意思，变化非常快。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变化越大就越觉得有意思，越开心。”相比于日本人之间强烈的边界感，竹内亮表示他更非常喜欢中国人的“随意”。“在中国，我和很多第一次见面的人，都能马上一起吃吃喝喝，这在日本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他留在中国的理由，就是他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都在中国。

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副院长陈光宇认为，《我住》作为一档纪录片节目，最大的特点和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其中蕴含的多元文化冲突。带着这种多元文化的视角，人们可以在节目中发现更多的文化差异和由此带来的戏剧性冲突、紧张感与新奇感。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剧本，《我住》系列纪录片可以捕捉到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与人间冷暖，可以寻找到那么多普通而又精彩的人物故事，展现丰富多彩的百态中国。竹内亮作为一个专业的纪录片导演，放弃了许多专业的拍摄束缚，以“素人”风格、深度“共情”、不时“出戏”和强烈的现场感，不带有一丝职业电视人的技术包袱，没有讲究的画面，炫目的拍摄技巧，也为观众提供了观察社会的多元视角。深圳文化学者韩望喜认为，竹内亮式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提供了用国际视角讲好中国故事的范例。

当下，城市化与流动性的加速，全球化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与人类生活，带给人一种文化上的多样性审美体验。正如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所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陈光宇认为，从《我住》系列纪录片中，人们可以真切地看到多元文化视野下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在普通人生及人生中的展现，正是这一点尤其打动人。这也是《我住》系列纪录片被人们持续追捧、热度始终不减的主要原因。